

跨學科與人文學科的危機： 再論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功能*

王 寧

[提 要] 作為對葉祝弟文章以及任劍濤的回應性文章的回應,本文贊同跨學科的人文學術研究,並認為,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不能不影響到人文學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研究。跨學科這個並不算十分新穎的方法或學術範式頻繁地為人們談論,這應該是全球化時代人文學術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熟悉人文學術史的學者不難看出,所謂跨學科並非當代出現的新鮮事物,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那些今天仍頻繁出現於我們的學術著作或沙龍的大理論家、大學者,許多都是跨學科的學術大家,他們不僅跨越了學科的界限,同時也跨越了時空的界限,不斷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學者。雖然跨學科未必能挽救人文學科的危機,但至少可為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開闢一個新方向,並有助於人文精神的堅守和重建。

[關鍵詞] 全球化 人文學科 跨學科 全球人文 人文精神

[中圖分類號] C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3 - 0115 - 11

在當今的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文學術界,談論跨學科研究以及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經形成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以及接踵而來的各種積極回應和實踐,確實使得那種認為“隔行如隔山”的傳統學者難以跟進當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便適應社會的需求,而要他們基於自己早年所受到的單一學科訓練去進行跨學科研究則更是有難度的。這樣一來,不少人文學者便再度發出“人文學科的危機”的聲音。另一些人則認為,對於人文學者來說,跨越學科的界限從事一些有限的跨學科研究應該是可行的,而且這也許正是人文學科得以擺脫自身危機以適應時代發展的一種選擇。至於究竟如何應對這種現象,一向銳意進取並在近十多年來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術刊物《澳門理工學報》發表了青年學者葉祝弟的文章《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緊接著該刊又發表了素以跨學科研究著稱的中年社會科學學者任劍濤的回應性文章《人文學科的“跨學科”自救:學科問題或是人文問題》,從而將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推向一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藝術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號:23ZD03)的階段性成果。

個新的高度：這不僅是一個學科的問題，而更是整个人文學的問題。在此我特撰寫此文，也算是參與這一討論，同時也藉機就教於兩位學者及廣大讀者。

一、全球化時代與人文學術的跨學科研究

作為一位以文學研究為主業的人文學者，我自然立足自己的學科專業，但也不排除跨界進入其他學科領域發表自己的一孔之見。熟悉我的學術生涯和著述的讀者也許記得，當比較文學這門在中國還算相對新穎的學科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興起時，我是中國比較文學界率先提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之一。^①後來我在北京大學用英文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弗洛伊德主義與西方和中國現代文學》(*Freudianism and Moder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更是一篇跨越文學和精神分析學的學位論文，據說當時在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時還引發了一些爭議，^②但畢竟最終還是得到了大家的認可。^③之後我對後現代主義文學和理論、後殖民主義文化以及文學生態批評的研究等，無一不是跨學科的人文學術研究。因此我懷著極大的興趣首先閱讀了葉祝弟洋洋灑灑的大作《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發現其中回應並批判了這一現象，在葉文看來，當代風行的跨學科研究大致可分為這樣三種形式：橫跨、斜跨和內跨，並在跨學科之外演化成依附式跨學科、掏空式跨學科、隨意式跨學科以及虛假式跨學科等四種變體。應該承認，他的這種批判性概括基本符合實情，並對其中的弊端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確實有助於我們認識什麼是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並能識別那種打著跨學科之名糟蹋人文學術研究的淺陋研究。作為一篇回應性文章，任劍濤則首先肯定了葉文的一些批判性洞見，但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既然從事跨學科研究並卓有成就者在當今時代屈指可數，它在很大程度上應是那些學識淵博的天才人物所為，其他的多數學者則難以做到，因此跨學科研究確實不可能扮演真正拯救人文學科的角色，也許恰如同我們經常所說的“治標不治本”。作為一位擅長跨學科研究的政治學學者，任劍濤本人的學科歸屬應該是社會科學學科，但是他從一位有著強烈人文情懷的圈外人的角度準確地診斷出人文學科所陷入的“危機”之症狀：並非是學科問題，而更在於一種人文精神的缺失和衰退。因此他認為人文學科的學術根脈，正是人文精神，人文學科需要貫穿的，也正是這樣一種精神。而現在的當務之急正是應該重建一種新的人文學科和人文精神。實際上，任劍濤的這種主張也正是我多年來孜孜以求試圖建構的一種理想化的人文學科。有鑑於此，我在本文中主要以建構為主，尤其是從我提出的“全球人文”視角進行建構。

就我們所處於的全球化時代而言，這確實是一個不同於過去的時代。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不能不影響到人文學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研究。一個並不算十分新穎的方法或學術範式再度浮出學術的地表，並頻繁地為人們談論甚至炒作：跨學科研究。當然，圍繞這個話題所引發的爭論也不在少數，但至少說明這一話題具有引人思考的批評價值。熟悉人文學術史的學者不難看到，所謂跨學科並非當代的新鮮事物，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那些今天仍頻繁地出現在我們的學術著作或沙龍的大理論家，許多都是跨學科的學術大家，他們不僅跨越了學科的界限，同時也跨越了時空的界限，並且通過翻譯的中介，不斷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學者。這在任劍濤的文章中也有所提及，但並沒有得到充分展開，這便給我的進一步討論留下了些許空間。

我想在本文中強調的是，跨學科研究是可行的，而且確實能夠產生出在不同學科領域內都有著廣泛影響的成果，這一點不僅自然科學大師早已做到，而且少數人文學術大師在我們的前頭也早已

十分精當地做到了,因此它不無一定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記得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我就在一篇討論加拿大神話原型理論家和比較文學學者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之於當代文化研究的意義時指出,“根據當代弗萊研究的權威性學者羅伯特·丹納姆(Robert Denham)的考證,從各國學者對弗萊以及其著述的引用和評價來看,他的地位應當排在馬克思、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列寧、柏拉圖、佛洛伊德和羅蘭·巴爾特之後,是一位高踞於自己時代之上的偉人,他應當被當作一位劃時代的思想家來研究。”^④當然,這只是當代加拿大的一位以文學批評著稱的人文學者弗萊及其著述所顯示出的巨大影響力。我試圖論證,弗萊的影響力之所以遠高於那些專事作家作品研究的國別文學研究者,正是由於他在自己的文學批評和研究中,早已超越了國別文學的界限,也超越了文學學科本身的界限,達到了比較文學和一般的文學理論研究的高度,因此他得出的結論就可以為英語世界以外的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所引證和討論。更為主要的是,他的研究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徵:不僅跨越了人文學科的文學與宗教及人類學的界限,也涉及遠古時代的神話和現代原型心理學,此外他還借鑑了具有科學特徵的結構主義方法,因此他的著作《批評的剖析》難以為那些專注新批評的“細讀”研究的學者們所理解和接受。確實,這部巨著在最終問世之前曾被十多家著名大學的出版社拒絕,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的文學研究突破了當時十分流行並佔主導地位的新批評細讀方法,大大地“跨了界”,最後才幾經周折由在學界享有盛譽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但今天的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將其視為新批評之後英語世界乃至整個西方學界最重要的文學理論著作之一,並被譯成了二十多種語言,成為公認的現代文學理論經典。正是由於這一點,弗萊的著述才有可能得到眾多學科學者的廣泛引證和討論。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今天在中國的語境中探討人文學科在當今時代的作用,無疑也是一個跨學科的理論課題,除了它的重要學科意義和學術價值外,之於我們中國人文學界的意義也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它可以促進國際上的人文學術交流,從而起到某種人文外交的作用。二是通過瞭解國際學界,尤其是在其中佔主導地位的西方學界對中國的關注及時地制定我們的對策。三是通過與國際同行的對話和交流,把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進而達到構建中國自主人文學術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之目的。既然這一課題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那麼我們首先就必須面對並回答這個一直纏繞我們並令我們茫然不知所措的問題: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性質及作用,以及人文學者如何創造性地進行跨學科研究。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性質及作用。毫無疑問,全球化這個概念(globalization)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已經作為一個高頻詞出現並廣為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引證和討論。它作為一個熱門話題,研究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學者需要面對它,研究經濟學的學者更是關注全球經濟的起伏回落,研究軍事的學者尤為關注彈道導彈的射程以及所波及的國家和地區,研究醫學的學者則密切關注全球氣候變化對傳染病毒的傳播,研究文化問題的學者則更為關注它之於地方文化的作用和意義,如此等等。由於這些學科的學者都有著自覺的學術國際化意識,因此他們大多將自己的論文用英文撰寫發表在國際權威刊物上,因而便有著較高的被引次數,有些佼佼者甚至在斯坦福—愛思唯爾發布的全球 2% 頂尖科學家年度影響力和終身影響力榜單中也赫然在列。然而,令我們不安的是,在國際人文學科各分支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上,中國學者的研究論文無論就其數量還是質量或影響力而言都相對落後,近十年來雖然有著根本的好轉,但依然與自然科學諸學科的影響力差距甚大,與社會科學的一些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等的影響力也有著相當的差距。因而毫不奇怪,一直就有人文學者抱怨中國的人文學術在國際學術界發不出聲音,或者

患了“失語症”。^⑤我們雖然並不苟同“中國人文學術患了失語症”這種偏激的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也即在公認的國際人文學科各分支學科的權威學術刊物上,我們確實不常見到中國學者的論文,更遑論名列各種高被引學者榜單了。當然,這其中的意識形態和語言文化霸權的因素固然不可排除,但我們中國學者的主觀努力,也即跨語言、跨學科以及國際化的意識也遠遠不夠。這就需要我們認識到人文學科研究的國際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是客觀上人們對文科的忽視甚至打壓等因素也應該得到關注。

就在我撰寫本文時,偶爾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全球文科倒閉潮,來了》,這篇文章向我們人文學者提出了這樣一個警醒:文科的萎縮甚至消亡已不僅僅是一個出現在中國的現象,而更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⑥當然,也有文章立即予以反駁,力圖論證人文學科在當今的不可或缺性,^⑦但大多數網上的文章都對前者予以回應。這樣,我們便必須面對這一令人難以簡單回答的問題:今天我們學習文科還有什麼用?如果果真沒有什麼用的話還不如任其被裁撤和壓縮。毋庸諱言,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管我們承認與否,我們都無法擺脫全球化給我們的各項工作帶來的影響。之於我們人文學科,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確實有助於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並為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產生和長足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對傳統的人文學科則起著擠壓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充分利用全球化的這個平台和契機,同樣能有效地推進中國文化及人文學術的國際化。應該說,近十多年來中國人文學術國際化的長足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此外,我本人的學術生涯的發展也一直受益於全球化和跨學科研究。

那麼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作用體現在哪裡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已在多種場合作過闡述,這裡僅再略述一二。首先,如前所述,人文學科在現代大學體制內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對於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就更是如此,這也就是為什麼像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世界頂尖一流大學總是不遺餘力地在全球範圍內延攬一流文科人才以充實其師資隊伍的原因所在。因為這些大學的人文學科確實為它們固有的光環增添了新的光彩,使其無愧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稱號。其次,人文學科除了發展自身的那些看似無用的分支學科外,還可以在所在的大學校園裡營造一個良好寬鬆的人文環境和學術氛圍,促進各種學術思想的交流和對話,正是在這樣的交流和對話中,新的思想和新的成果才能產生,新的大師才能夠脫穎而出。第三,設在大學裡的人文學科除了培養本學科的拔尖人才外,還有著服務於整個社會的義務,它們可以向社會提供先進的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念,提升人們的倫理道德修養,鞏固人們的信仰,從而使人們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动性。這也正是為什麼當今世界的五百強企業大都十分重視企業文化建設的原因,那些企業的老總不時地也會邀請一些人文學者前往講學,給他們的員工灌輸一些人文知識,使他們更為有效和人性化地管理好自己的企業。

現在再回答第二個問題:人文學者如何創造性地進行跨學科研究。既然我們並不否認跨學科研究的合法性,那麼我想強調,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從事跨學科研究的人文學者必須具備較高的素質和至少兩方面的條件:首先,他必須在自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學科領域內有著深厚的造詣和相當的成果,也即應當得到本學科領域的認可,這樣即使他在跨越本學科進入另一個學科領域內發表的著述不那麼具有原創性而未得到該學科學者的認可也無傷大雅,絲毫不會影響他在本學科的地位。其次,他必須在自己涉獵另一個學科領域前做好足夠的功課,熟悉該學科領域的研究現狀,這樣他在進入另一學科領域時才不致於被視為門外漢。我這裡還想強調一點,對於那些從事外國理論和人文學術研究的學者,不宜僅依賴翻譯過來的文獻去從事研究,他還應當能夠熟練地閱讀外文文

獻,充分掌握並利用第一手原文資料,這樣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可。當年通曉多種語言並擅長跨學科研究的季羨林先生在留學德國之前就發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⑧當然,季羨林的這種貌似“偏激”的言辭實際上又忽視了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另一個任務:在國外學習的同時,向所在國的人們傳播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應該承認,季羨林在他所專攻的印度學和佛學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作為其代價,他並沒有很好地利用他的英語和德語在國際上傳播中國文化的精髓。但他當年提出的警醒今天依然可以作為衡量一個研究國外學術的中國學者是否能得到國際同行認可的標準之一。我在此還要加上另一個標準,也即專事外國學術研究的中國學者還應當具備用國際通用的學術語言英語撰寫學術論文和著述、並直接與國際同行討論和對話的能力。而且只有具備這種能力,中國人文學術真正的國際化水準才能得以彰顯,中國的人文學術才能產生出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大師。

我這裡依然以全球化問題研究這一具有跨學科和國際性的前沿課題為例。雖然在中國國內,談論全球化問題已經成為一種時髦,但是在國際學術界,部分中國學者卻仍然陷入了“失語”的狀態。本人在這一跨學科領域耕耘二十多年,在國際學界發表了大量著述。^⑨2006年由英國勞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全球化百科全書》編委會邀請我加盟並出任副主編,負責整個人文學科的條目。這本書後來譯成中文,並由譯林出版社出版,這至少標誌著中國學者在全球化研究中,尤其是在人文學術研究方面,掌握了部分話語權。此外,我還通過對西方學界的全球化研究的批評性分析,再加之全球化在中國的實踐,就全球化的理論建構發表了著述,主要觀點包括:作為一種經濟一體化運作方式的全球化;作為一種歷史過程的全球化;作為一種金融市場化進程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全球化;作為一種批評概念的全球化;作為一種敘述範疇的全球化;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全球化;作為一種理論話語的全球化。^⑩

由此可見,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確實給我們中國的人文學術跨學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卓有成效地跨越學科的界限,更要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這樣才能使得中國的人文學術與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

二、全球化時代的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

毋庸置疑,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有助於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發展,而對傳統的人文學科和人文精神則有著不同程度的損害。因而它使得一些僅在某一個狹窄的學科領域內按照傳統的方法做封閉式學問的人文學者難以適應,他們既不能熟練地在電腦上寫作論著,又無法嫺熟自如地使用數字化檢索工具來查閱資料,於是感到自己幾乎被社會和學界放逐到了邊緣。曾經為自己的學者地位倍感自豪的他們今天不得不感歎:“人文學科的危機”來臨了。但是這是一個歷史的大趨勢,因而任何人也無法阻擋這一趨勢。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筆者以為,我們一方面應該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充分利用全球化這個平台和數字技術,使得我們的人文學術研究得以更新,並朝著國際化和跨學科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又要在數字技術大行其道的學界堅守人文立場和人文精神,這對於人文學者來說確實是很難做到兩全。但如果能部分地做到這樣,至少不會為自己被邊緣化而倍感失落。在這方面,我們的一部分人文學者既熱情擁抱科技同時又堅守人文立場,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全球化給人文學科帶來的積極的和消極的方面,並因勢利導盡量使其朝著有利於人文學

術研究的方向發展。這些努力已經起到了初步的成效。在我們這些有著國際視野的學者的努力下，中國的人文學科除了走向跨學科研究外，還在跨越語言和國別界限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並在國際學界佔據了一席之地。^①就這一點而言，中國的人文學科又受益於全球化和跨學科研究。

1998年8月，我在北京主持了中國首屆“全球化與人文科學的未來”國際研討會。出席那次研討會的主要是一些從事人文學科教學和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其中文學和文化研究者居多。當然，那次研討會探討的是全球化之於人文學科的作用，但已經涉及了其他相關的一些社會科學學科領域。因此部分恪守傳統的人文學者對這些跨界行為感到不解，為什麼你們這些新銳人文學者，尤其是文學研究者，對一些前沿學術理論話題如此敏感並能迅速作出自己的反應？作為一個經濟現象的全球化與人文學科有什麼關係？我的回答是，主要有三個原因，或三個優勢所使然：其一，人文學者主要就是研究人，所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環境及其相關的學科領域。其二，人文學者廣泛涉獵多學科的知識領域，因而很容易敏銳地覺察到整個學界的前沿理論話題並及時地作出自己的反應。其三，人文學者大都受過嚴格的語言文字訓練，擅長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當然，這既可以說是人文學者的長處，同時也是其短處。正如有的社會科學學者所譏諷的：人文學者的論文中既沒有精心製作的圖表，也缺乏具體翔實的數據，只是你們天馬行空般地運用推理和思辨的力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你們得出的這些結論能夠被實踐所驗證嗎？因此毫不奇怪，人文學者的成果引發的爭議也很大。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從諾貝爾獎的各種獎項的評選結果所產生的不同反響見出這種差別：屬於科學的獎項一般比較容易得到同行的公認，這方面的專家也可以對可能的諾獎得主進行較為準確的預測，其後所產生的爭議也不是很大；而屬於人文並受制於意識形態的獎項——文學獎及和平獎則可能會產生很大的爭議和褒貶不一的評價，這就說明對這兩種獎項獲獎者的評價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人為性，並受制於意識形態。此外它們與諾獎評委的好惡和各自所持的評價標準和傾向也有很大的關係。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一位公認的跨學科理論大師的境遇得到啟示：1992年，英國劍橋大學為了表彰法國解構主義理論大師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當代思想和文化的卓越貢獻，準備授予德里達名譽博士學位，但這一動議很快就在校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授予德里達名譽博士學位的動議並非哲學系提出的，而是文學系提出的，因為他的影響力被公認為在文學研究界遠高於哲學界，而他本人的著述也介於哲學和文學之間，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徵。有鑑於此，校方不得不採取全體教授投票表決的方式來決定。所幸的是，投票的結果是336:204，德里達最終獲得了劍橋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而對其國際影響力遠不如德里達的華人武俠小說家金庸的名譽博士學位授予建議，則沒有產生什麼爭議，甚至不少劍橋的文科教授都不知道金庸何許人也，儘管當時他的一些作品已經有了英譯本。這樣的一個結果反而使金庸感到失落，他之後放下身段以一個普通學生的身份申請攻讀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但畢竟他年事已高，直到去世前也未完成學業。而德里達於2004年逝世時，國際學界則明顯地感到“人去樓空”，甚至連對德里達批評得最激烈的英國文論家伊格爾頓也認為“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西方人文思想進入了一個“後德里達”或“後理論”時代，一些英語國家的德里達研究者於2014年創辦了專門研究德里達的學術期刊《今日德里達》（*Derrida Today*），由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出版，如此等等。所有這一切均說明，一個真正的學術大師必須是跨學科的，至少能夠在整個人文學科和思想界遊刃有餘，否則他只能算作是某一個學科專業領域的專家，並不能稱作人文學術大師，更遑論產生廣泛的跨學科影響了。

十多年前,美國學者傑佛里·哈派姆(Geoffrey Galt Harpham)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題為《人文學科和美國夢》(*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2011),這本書全面地闡述了人文學科的特徵以及它在美國學界和高校所佔據的獨特地位。作者是一位專事文學研究的學者,長期擔任美國國家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因此他以這一身份著述闡述人文學科在當今時代的功能和地位無疑有著不同凡響的意義。正如出版社所做的宣傳和介紹所言,哈派姆的這本書在一個被認為人文學科處於“危機”之境地的時候出版是非常及時的,因為它主要從文學研究的角度探討了最近幾年來出現在美國人文學界的一些相互關聯的問題:語文學在形成人文學科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曾經令人振奮但此時卻使人煩惱的角色;導致人文學科始終處於危機狀態的各種原因;慈善事業在人文學科中扮演的塑型的角色;以及由愉悅主體提供給文學研究的新的可能性,等等。而在實際論述中,該書所涉及的問題遠遠不止這幾個。

首先,對於人文學科在美國的創立和今天所處的地位,哈派姆指出,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文學科實際上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學術體制發明的一個產物,當時,它被設想為表達美國文化以及美國的民族利益的工具。眾所周知,美國作為二戰的戰勝國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都達到了空前的地位,它需要斥資建立人文學科,以便培養一些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念來服務國家和社會的人才。為了實現這一“美國夢”,美國人一直努力追求穩定和繁榮的物質生活,並且習慣於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欣賞人類的精神文化產品。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強大使美國有足夠的能力和財力建立一些研究藝術與人文相關的學科,以培養獨立的美國個體的成熟人格。因此建立一些看似無用但實質上卻有著大用的人文學科的意義便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到了20世紀中葉,‘人文學科’這個術語用來指專門研究哲學、文學、藝術,有時也包括歷史在內的學科群,並逐步形成一些規律”。但是對於究竟什麼是人文學科,它與常常也被統稱為“文科”的社會科學學科有何不同,學界還一度有著模糊的認識,甚至常常將其與那些注重實用的社會科學學科相混同。但是哈派姆卻對之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與科學、意識形態、機械、行為、大眾社會、對理性的弘揚以及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這些東西相對,人文學科往往與賦權(empowerment)、解放、培育(cultivation)、公民責任(civic responsibility)以及幾乎無一例外地,包括道德行為(ethical behavior)及性格發展相認同”。^⑫不可否認,哈派姆心目中的人文學科不同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科,那些學科有著明顯的目的和功利性,直接服務於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需求。而人文學科所關注和探討的東西往往是“虛”的,所提出的課題也無法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甚至在短時間內都很難收到立竿見影的社會效益,但是對培養人的綜合素質以及獨立思考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卻有著極大的作用。尤其是對於那些以理工學科為主、兼帶發展文科的著名大學來說,若要建立和發展文科,首先考慮建立的就是那些應用型的社會科學學科,然後才考慮建立和發展藝術與人文學科。

這樣,建立人文學科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它不求在短時期內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它作為一種象徵資本,有時也能轉化為實質性的“資本”。此外,它在大學的各門學科的分布中,常常佔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位置。我們經常說,一所大學若沒有人文學科,就等於沒有文化。與社會科學學科的可驗證性特徵所不同的是,人文學科提出的命題和研究課題常常無法應對所出現的問題,因而常常陷入危機之中。正如哈派姆所指出的,這種危機具體體現在:“歷史無法告訴我們關於過去的全部真實情況,文學研究也無法解釋文學,哲學也無法講述真理。這三個學科的每一個都挑選出人類生存的某些方面提供給我們明確的理解,或者說使我們心領神會,即這些方面僅代表總體中的部分。勞動分工、合作以及共同依賴這些概念告訴所有的人文學科,它們原則上總是漏洞百出(por-

ous)並暴露給其它學科”。^⑬應當承認,這既是人文學科的缺陷,同時也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人文學科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威脅或災難,倒或許是描述人文學科的一個永久性特徵的過於戲劇化的方式,也即人文學者不僅在接受方面可以做得很好,而且還可以把他們所掌握的所有資源加以宣傳推廣”。^⑭我認為人文學科的價值就在於它的可討論性和開放性特徵,它能夠激發人們進行思考和討論,以便取得更好的結果。這應該是我們辯證地看待人文學科所處的境遇的正確態度。因此,所謂人文學科的危機反過來說又是促使我們的學科從內部得以變得更新的強大動力,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使我們的學科健康地發展。

那麼為什麼會有人認為當下出現了一股“文科倒閉潮”呢?我想這與其說是人文學科的危機,倒不如說更是人文精神的危機。當一個社會變得愈益“現實”和“物質至上”時,人們的精神追求就變得淡漠了:一切都向“錢”看無疑會使人喪失基本的人性和情感,最終淪為物質的附庸。在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們不難看到,物質生活越是豐裕,人們的精神生活就越是空虛,因而難免不陷入難以自拔的人文精神“危機”之中。這也正是為什麼在今天的物質生活相對富裕的大都市心理醫生頗受歡迎的原因所在。這種現象在社會科學學者任劍濤的文章中也得到較多的討論,在他看來,與其說是人文學科陷入了危機,倒不如說是人文精神出現了危機。我也很贊同他的這一看法。

三、全球人文視野下的跨學科研究

如前所述,人文學術的跨學科研究,核心就在於“跨”字,跨的恰當固然可以收穫滿滿,跨的不當很可能滿盤皆輸。因此,我們今天從事的跨學科研究不僅要跨越學科的界限,更要跨越語言和國別的界限,以便在一個廣闊的全球人文視野下從事跨學科研究,這樣我們所達到的創新就不僅是在中國的語境中達到的相對創新,而更是在全球語境中達到的絕對的創新。這一點我本人深有體會,並受益極大。^⑮也許有讀者會問,我為什麼要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提出一個“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的概念?^⑯難道人文學術也和自然科學一樣可以超越國界嗎?隨著本人對人文學科各分支學科領域的涉獵和在國際學界發表著述,筆者越來越感到,人文學科作為一門具有科學和學術價值的學科也應該如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超越國界,也即人文學者所討論的話題不僅應具有中國的本土特色,有效地解決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應該具有普適的全球意義,探討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和關切,進而為國際學界貢獻中國의思想和智慧。本人以為,一個優秀的人文學術大家,應該是優秀的跨學科研究者,否則他只能是某一個狹窄的學科領域內的專家,而不能成為一名人文學術大家。因此他的學術成果不僅要得到本學科學者的認可,同時也要得到所涉獵的其他學科領域的學者的認可,這樣他的跨學科研究就真正達到了“跨”的效果。如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人文學科的成果也照樣可以得到科學計量法的定量和同行專家的定性評估:人文學者的影響力完全可以通過大數據的量化得到相對公正的衡量,而他們的學術成果的價值則須得到同行專家學者的定性評價。因此提出“全球人文”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在此,筆者再次簡略說明本人的“全球人文”概念要點。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的今天,人文學科已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和波及,在文學界,世界文學這個話題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並成為新世紀比較文學學者的一個前沿理論話題。在語言學界,針對全球化對全球英語之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我本人也提出了複數的“全球漢語”(global Chineses)之概念。在哲學界,一些有著探討普適問題並試圖建立新的研究範式的有抱負的哲學家也提出了“世界哲學”(world philosophy)這個話題,並力主中國哲學應在建立這一學科的過程中

發揮奠基性作用。在史學界,則早有學者在世界體系分析和全球通史的編撰等領域內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幾乎所有的國際權威性數據定量評估中,中國的人文學者中只有極個別躋身其中,而在一部題為《21 世紀的 21 位思想家》的著作中,竟然沒有一位來自中國或華裔的思想家得到討論。^⑩因此,我認為,我們今天提出“全球人文”這個概念是非常及時的,而且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學者們也確實就這個話題有話可說,並能在這個層面上進行卓有成效的對話。

其次,既然“全球人文”這個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那麼人們不禁要問,它的研究對象是什麼?難道它是世界各國文史哲等學科簡單的相加嗎?我認為並非如此簡單。就好比世界文學絕非各民族文學的簡單相加那樣,它必定有一個評價和選取的標準。全球人文也是如此。它所要探討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題,也即從一個廣闊的全球人文的視角,探討全世界的人文學者都普遍關注的具有普適意義的話題。例如當前為人們談論比較多的話題,如全球氣候變暖、全球治理、人工智能之於人文學科的影響,等等。^⑪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不僅要對中國的問題發言,同時也應對全世界、全人類普遍存在並備受關注的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我們中國人文學者的抱負和使命。

最近,兩個以數據作為依據的機構分別發布了學者的影響力榜單:中國知網發布的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和美國斯坦福大學約翰·埃爾尼迪斯(John Ioannidis)教授團隊聯合愛思唯爾傳媒集團共同發布的全球 2% 頂尖科學家 2024 年度影響力和終身影響力兩個榜單。由於前者僅限於國內學者,而且人數眾多,我就不去評估它的作用。後者主要是自然科學學者的影響力,但也包括人文社會科學。本人作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也榮幸入選後兩個榜單。

以下是終身影響力榜單中排名前十的文學研究者:

Butler, Judith(朱迪斯·巴特勒,美國性別理論家)

Mignolo, Walter(沃爾特·米紐羅,美國去殖民性理論家)

Derrida, Jacques(雅克·德里達,法國解構主義理論家)

Berlant, Lauren(勞倫·勃朗特,美國情感理論家)

Bhabha, Homi(霍米·巴巴,美籍印度裔後殖民理論家)

Nancy, Jean Luc(讓-呂克·南希,法國後哲學家)

Rancière, Jacques(雅克·朗西埃,法國哲學和美學家)

Jameson, Fredric(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Halberstam, Jack(傑克·霍爾柏斯塔姆,美國性別理論家)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佳亞特里·查克羅巴蒂·斯皮瓦克,美國印度裔後殖民理論家)^⑫

在這份榜單中,德里達、勃朗特、南希和詹姆遜已去世,但其影響力仍很大。我們不難看出,所有這十位人文學術大師都是跨學科的人文學者,其對文學研究的持久影響力遠高於那些專事文學研究的學者。特別是幾位哲學家除了在自己的學科領域地位穩固外,在文學研究界也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這就證明了筆者前面的論斷:真正能夠載入史冊的人文學術大師必須是跨學科的,而且是跨語言和跨國別的。當前,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中國人文學者已經認識到,中國的人文學者不僅要在國際中國研究領域掌握話語權,同時也要在一些具有普適意義的基本理論話題的研究方面爭得最起碼的話語權。由此看來,在一個全球人文的視野下探討跨學科研究確實任重道遠。在這方面,中國的人文學者應該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①參閱拙作《比較文學：走向超學科研究》，北京：《文藝研究》，1988年第5期，以及樂黛雲、王寧主編《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②應該感謝時任北京大學英語系主任胡壯麟教授，他雖然是一位語言學家，但是他深深地熱愛文學，並且經常參加比較文學國際學術會議。他在1989年夏天參加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會議前，要我向他簡略地說明我的博士學位論文（8月已通過答辯）與我所在的學科英語語言文學有何關係。我向他解釋說，當時歐美的著名大學，如哥倫比亞大學的英文系就叫“英文和比較文學系”，我的導師楊周翰先生所從事的就是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我在文中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喬伊絲和勞倫斯都是英語世界的大作家，而文中所討論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幾位作家都是受到這些作家和理論思潮影響的。此外，我的論文又是用英文撰寫，因此本身就算作一篇英語文學研究論文。

③我的博士論文的一些主要觀點，後來分兩部分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Cf. Wang Ning, “The Reception of Freudian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art 1, *China Information*, 5. 4 (1990): 58- 71; Part 2, *China Information*, 6. 1(1991): 45- 54.

④參閱拙作《弗萊理論的後現代視角闡釋》，收入王寧等編《弗萊研究：中國與西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3頁。資料出處見Robert Denham ed. *Northrop Fry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Preface”, ix.

⑤這方面尤其可參閱曹順慶：《文論失語與文化病態》，長春：《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以及對之的質疑和批評文章，蔣寅：《文學醫學：“失語症”診斷》，廣州：《粵海風》，1998年第5期；蔣寅：《對“失語症”的一點反思》，北京：《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

⑥參閱網上文章：《全球文科倒閉潮，來了》，<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12-31/doc-ineckkxt1830669.shtml>；也可以參閱對之的反駁文章《文科消亡成為一股全球性浪潮，到底是潮流，還是逆流？》

⑦參閱對前一篇文章的反駁文章《文科消亡成為一股全球性浪潮，別慌，且看全球變局下的真相》，<https://www.163.com/dy/article/JKH2A9U60528A74T.html>。

針對前一篇比較偏激的文章，該文提出了一些應對策略。

⑧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年，第54~55頁。

⑨關於我在國際學界發表的論述全球化與文化方面的英文著述和論文，請參閱：*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Ottawa: Legas Publishing, 2010; “Postmodernity, Postcoloniality and Globaliz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Social Semiotics*, 10. 2 (2000): 221- 233; “Chinese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Vol. XVII, No. 2(March 2000): 55 - 64;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Neohelicon*, XXVIII/1(2001): 55 - 66; “Globalizing Chinese Literature: Moving toward a Rewrit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38) (2004, February): 53- 68; “Identit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0.3- 4(2003): 526- 54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1.4 (2004): 584- 602; “Death of a Discipline”? Toward a Global/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eohelicon*, XXXIII (2006)2: 149- 163;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3)(2010), 159- 174; “Highlight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European Review*, 23. 2(2015): 273- 285; “Introduction: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s in the Global Contex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2. 1(2015): 1- 11; “Globaliz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mmentary,” *European Review*, 24. 2(2016): 177- 185.

⑩Cf. Wang Ning, “Globalisation as Glocalisation i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11(2015), 2059- 2074.

⑪儘管西方中心主義長期以來一直主宰國際學界，但是大數據的發明依然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學者的國際影響力。參閱董健鑫：《上海交大王寧教授再度入選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榜單》，<https://news.sina.cn/2024-09-21/detail-incpwvfr0188373.d.html>。

⑫⑬⑭Geoffrey Galt Harpham, *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 p. 14; pp. 39- 40; p.42.

⑮⑯國際跨學科頂級人文學術期刊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48, No. 1, 2024) 在最近的一期中共發表了 9 篇論文，專門討論本人的世界詩學建構。

⑰參見麥肯齊·沃克：《21 世紀的 21 位思想家》，姜昊騫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 年。在這本書中，柄谷行人、齊澤克、朱迪斯·巴特勒、蒂莫西·莫頓、東浩紀、全喜卿等東西方思想家都得到全景式的評述和討論，卻唯獨沒有來自中國的或華裔思想家得到討論。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位澳大利亞學者所參考的資料主要是英文文獻，但至少說明中國的思想

家和理論家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仍比較有限。

⑱幾年前，當機器和人工智能對翻譯產生了較大影響之際，我就應國際翻譯研究家聯盟的刊物《巴別塔》主編的邀請，為該刊編輯了一期主題專輯，探討了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翻譯。Cf. Wang Ning et al. eds.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 edited with Wang Hongtao),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69. 4 (2023), 尤其是本人撰寫的“Introduc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p. 437- 446.

⑲該文獻來源：Ioannidis, John P.A. (2024), “August 2024 data- update for ‘Updated science- wide author databases of standardized citation indicators’”, *Elsevier Data Repository*, V7, doi: 10.17632/btchxktzyw.7

作者簡介：王寧，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上海 200240

[責任編輯 劉澤生]